

▶▶▶ [上接 03 版]

政企合谋： 理解中国模式的 钥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聂辉华

另外影响合谋原因里面一些因素也没有讨论,比如法治环境,领导人任期。领导人任期也是一个话题,任期太短,他不能有稳定预期,任期太长看起来似乎有一个最优预期问题。至少目前来看似乎是有了一点。另外,我们考虑企业的时候也没有区分不同企业有什么区别,比如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它在合谋的时候有没有区别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去好多地方调研,几乎所有国企领导都在抱怨说民企竞争太无底线、无操守。这个很有意思,换句话说在行贿方面,民企可能成本比国企更低,为什么呢?如果是国企的话,大家犯不着拿自己政治生命为公家牟利,但是民营企业老板不会这样想。所以在制度不完善情况下,他有更强大的动力。相对来说,国企应该有天然优势,因为它跟地方政府比较近,更容易合谋。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合谋手段上不如民企那么灵活,所以很难说国企和民企作用更大。但是,抛开意识形态,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值得研究。

另外,还有外企,大家可能说外企比较规范,也许外企不那么容易参与合谋。一个是跟它的文化制度有关,比如美国有《反海外腐败法》,你在国外腐败也会受到美国法律追高,可能比较广一点。我们见到外企股份比较高的煤矿的矿难死亡率比较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把所有煤矿都卖给外国人呢?好像也不对,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不同企业在合谋方面确实有差异,而这个差异是不是持续的、显著的,有哪些因素影响,我们并没有深入探讨。另外,我们也没有讨论企业间竞争,有的说企业之间竞争趋向于减少合谋,但是也不一定,我们有的文章发现地方政府竞争越激烈,地方政府越倾向于帮助企业偷税漏税。所以,也可能竞争越激烈,越容易形成合谋,但是反过来想,如果竞争足够激烈,企业可以用脚投票,企业是不是可以选择更安全的生产方式呢?这个也没有定论,可能取决于具体的竞争环境。

另外,就是合谋的历史基础。大家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官商不分,或者商人基本上是依附于官员,就好像胡雪岩那样的商人之所以有市场,也是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商人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所以,在中国这种非对称的情况下,有时候想不谋很难,地方政府让你这样做,你能不这样做吗?大家知道铁本事件,其实不是铁本想上这么大规模的钢铁产量,是当地政府觉得是一个机会,把规模做大,我可以出政绩,所以就违规批地,是把大地块划成小地块,但是这个事情因为宏观调控原因没有成的原因,暴露了,地方政府和企业都受惩罚。但是,有可能这个企业是无辜的,至少他是被动的。不是你不想合谋就不合谋,有点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的感觉,你不参与就查你的税,谁经得起查呢?所以,在制度不完善的环境下,你想让企业有好的生产方式,好的经济增长,这个恐怕是不太可能的。这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历史更长远的探讨,比如过去的政商关系是怎么影响当下的政企关系。再深刻的思考就是为什么中国环境下发展不出来平等的政企关系,为什么政府和企业家之间不是平等的契约关系,而是依附关系。

另外,我们也没有讨论制度环境,这个是指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对合谋有什么影响。比如发达国家也有政企合谋,发达国家是不是比较容易发现这种合谋,还是说合谋成本更高呢?我们这里没有居民角色,居民我完全没有考虑,为什么?因为他完全起不到作用,如果居民有作用,他可以上街抗议,假如说这是一种民主参与的话,合谋是不是可以减少呢?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可能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扩大群众参与,对于瓦解合谋可能有作用。这个取决于顶层设计师愿不愿意这样做。所以,在这方面,还有媒体,我们这里也没有讨论太多的媒体的力量,一方面就是正常情况下媒体数量的增加,可能会有助于瓦解合谋,因为媒体可以曝光。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市场化潮流下,媒体竞争越激烈,有可能倾向于媒体和企业合谋。为什么?因为竞争越激烈,报纸靠什么生存下去?靠广告,现在没有人到报纸投广告,都到网络上去了,如果企业要跟媒体合谋,你合不合规?未必是市场化越发展,媒体就会越发挥监督作用。我们不能天然或者幼稚地期望市场竞争越发达,经济发展越往前,媒体就有更多曝光功能,这是取决于这个媒体是倾向于市场化的媒体,还是类似于《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这样政治性媒体。

另外就合谋的比较,除了中国这样的国家,像俄罗斯、像东亚、日本和韩国在高速增长时期,也存在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土地违法问题。它们发生这个事情逻辑是不是也跟中国一样呢?是不是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在威权国家?对于威权国家而言,面临比较大经济增长压力下,是不是更倾向于合谋?或者通过合谋获得经济增长是不是威权国家的普遍特征?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包括英国、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它们早期阶段,即便是在民主时期,是否也经历了这样的政企合谋? (完)

卢布在贬值,近期汇率曾跌破1美元兑80卢布,俄罗斯央行干预后,暂时稳定在1美元兑60卢布左右的水平,而这一水平较年初已贬值超过80%。卢布贬值即便不是断崖式,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降幅和波动性。先不论原因,现在最急迫的是,怎样抑制卢布继续坠落?

抑制卢布坠落的非常规政策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 刘琦



在较短的时间窗口内恢复内外部市场的信心,给予投机势力及国际制裁理性和市场化的回应。

其次,实行差别化的对外支付政策,坚持“有保有压”。本次卢布巨幅动荡似乎有造成俄罗斯全盘货币危机之势,颇似相关方在军事争斗、政治博弈、经济制裁领域衍生出来的“货币战争”。俄罗斯既要合理地利用外汇储备,履行国际支付义务,也要停止不必要的外汇支付,甄别对西方的债务,建立透明、划一的标准,什么支付、什么不支付,广而告之,稳

定预期,并不排除在选择性领域实行资本管制。为了防止汇率动荡演变为货币危机,俄罗斯应建立主权优先于经济的范式,差别化应对国际支付需求,避免以权及主权的结果替代货币动荡理单。原因在于,外汇储备绝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稀缺的资源要用在该用的地方;同时,对制裁和外部投机活动予以合理且必要的应对不仅形式上是需要,实质上也应让对立面产生一定的“痛感”。

最后,进一步使卢布兑换机制化,缓解货币兑换的巨大不确定性。脱离金本位制的信

用货币,其汇率之锚是综合国力,但影响锚摆动幅度的是信心,而信心属于行为和心理的范畴,影响信心的因素很多,外汇储备基础是否坚固肯定是其中之一。当然设计合理的外汇兑换制度无论是阶段性的还是长期的,都会通过市场对外汇储备的评估反作用于信心。在货币剧烈波动中学习建立卢布兑换机制化的措施和措施,不妨从以下入手。

一是,在外汇兑换年度规划的基础上对必要外汇支付,特别是经常项目实行敞开发付,对非必要国际支付实行日常或月度的计划性兑换。区别对外正常投资和资本外逃,对资本外逃实行必要管制。俄罗斯也可以仗仗其黄金生产大国的地位,向外汇市场释放黄金,辅助其提高国际兑换支付能力。

二是,在建立差异化的计划兑换安排后,货币当局可依照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入境情况,逐日对居民用汇登记,按次序分期依外汇流入情况进行兑换,量入为出。

三是,建立外汇兑换期权,行权价按照登记日到行权日的均值来确定。当卢布汇率下跌时,投资者使用登记日汇价,消除市场对卢布汇率的不确定性,筑牢底线,缓解恐慌情绪蔓延;当卢布汇率上升时,投资者以行权价兑换,放弃行权价与交割日汇率的升值部分,从而向市场释放强烈的信号,即俄罗斯的经济虽结构调整,但预期稳定;卢布币值严重低估,政府有能力扭转不利局面并稳定汇价和金融市场。外汇期权是技术性安排,本属于“器”,连“术”都算不上,但此时此刻却有“道”的因素,作用不可小觑。

以上都是抑制卢布坠落的非常规政策措施。需强调,经济结构失衡和高通货膨胀是卢布汇率的“阿喀琉斯之踵”,长远计还是要优化产业结构,摆脱经济对能源的过度依赖。

经济学的“新框架”与“新供给”

创新中的重要联通和“集大成”境界追求

财政部财科所 贾康 苏京春

2、“新框架”在“新供给”包容性拓展中的定位

“新框架”在“新供给”包容性拓展中的定位可从两方面考虑:第一,“新框架”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并不须像传统框架那样特别区分纯生产者和纯消费者,也不须特别划分供给端与需求端,但其所强调的专业化分工与经济组织模式,并未见与消费的直接相通,而是与生产即供给侧的直接相连,其对于“新供给”包容性拓展的贡献若还原到新供给经济学“五维一体化”的框架中,应定位于传统经济学供给侧两轮“否定之否定”的主线上,成为对古典自由主义供给思想的重要提升和充实。第二,值得注意的是,“新框架”理论工业化是由分工演化引起的结构变化(包括工业份额的上升、投资率和储蓄率的上升等),基于此而深入研究城市化和工业化问题,并可通过拓展宏观经济学框架进一步研究经济结构问题,构成新供给经济学“五维一体化”框架中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新框架”的缺陷： 对“新供给”的诉求

虽然“新框架”对“新供给”包容性产生了重要拓展,但是其从微观层面出发而带有一定的局限与理论缺陷。结合既有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成果,在“五维一体化”理论框架下,除了肯定“新框架”对“新供给”包容性拓展的贡献以外,其两个理论缺陷也从宏观层面面对“新供给”提出了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发展诉求,客观上构成“新框架”对“新供给”更深一层的启示。

(一)“新框架”的缺陷

1.对经济周期成因理解的片面性

“新框架”认为造成经济周期与失业的原因是某些产品有耐久性和不可分性,不可分可能造成产品的供过于求,而与产品耐久性相关的滞销则可能带来失业。这当然可以作为经济周期的一个成因,但导致经济周期的缘由中还包括了竞争的完全性、工会的作用、总需求的变化、信心的崩溃、储蓄—投资的变化等诸多经济因素。此外,经济周期的成因除固定资产更新周期之外,还包括以政治周期和心理周期为主的非经济性因素。这些未包含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性因素共同揭示了“新框架”对经济周期成因理解的局限性。

2.不能解决交换者之间的选择协调问题

“新框架”研究的是不同的行为人生产不同商品的情况,但不能解决交换者之间的协调问题。不同的行为人生产不同的产品,如果此时的交易效率很低(即交易成本

很高),那么行为人的最优选择是自给自足;如果此时的交易效率足够高,那么最优选择是进行专业化分工,不同的行为人生产不同的产品,然后每个人的产量扣除部分自用以外,其他产量用来交易给他人,这样就是更加有效率的选择。然而,不同的行为人生产之间也有可能生产相同的产品,因为他们生产之前往往不会自发进行沟通,而如果确实选择了生产相同的产品,交易就不能发生,造成“产能过剩”和再生产阻滞。

(二)对“新供给”的启发

“新框架”的两大缺陷可启发对“新供给”更深层次的思考。经济周期和协调问题不仅与“新框架”有关,还与旧框架有关,属于需求和供给分析框架、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分析框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恰恰凸显了对“新供给”的需求。

1.更全面地认知旧框架与新框架都无可回避的经济周期问题

在经济实践中,经济活动总会沿着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经历周而复始、有规律性的扩张和收缩。针对经济周期的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旧框架中包含了“凯恩斯革命—供给学派—凯恩斯复辟—供给管理”的调控机制发展逻辑,从而证实供给管理是旧框架中供给侧经济理论研究的理性回归;新框架则是从微观视角上的一定片面解释了经济周期的成因,而未充分考虑到其他经济因素以及非经济性因素的影响,但由于新供给经济学与“新框架”存在的理论视角的联通性和基本逻辑的一致性,新供给完全可以在宏观层面对于分工和全面化的经济周期问题提供更具优化和专业的认识解决。

2.更有效地认知旧框架与新框架都难以解决的顶层规划问题

采用旧框架进行分析,市场存在失灵的问题,经济周期正属于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公共品等问题也属于市场失灵;采用新框架进行分析,不同的行为人生产不同的产品,且这种选择是自发进行的,如果选择不恰当,那么不同行为人生产之间不一定能够成为交换者,从而无法充分实现效率。不难发现,无论是由于市场失灵而导致的某种产品的产量供过于求,还是由于专业化分工过程中存在行为人生自发选择生产的不协调,归根结底都形成“经济自由化”命题所无法解决的领域。引发失灵和不协调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但无论由何种原因引发,这种宏观视角下可以视为“顶层规划”的问题(如“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到位”结合、合作问题),恰是新供给经济学所关注的焦点之所在。

四、重要的总结：

理论与经济实践的互动式完善

“新框架”对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认识形

成传统理论经济学的重要补充,其所采用的超边际分析模式也是传统理论经济学数理分析方法运用中的创新。然而,经济实践的现实,既不只是与旧框架的对应,也不只是与新框架对应,而是两者以及尚未开拓的研究领域的错综结合——尤其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种结合的框架特别需要其能够为认识经济增长提供更为开阔的视角。

(一)理论发展：传统与新兴相结合的相对完整框架

传统旧框架与新框架的结合,能够为理论经济学构建一个相对更为完整的框架,在此框架启发下,我们在“新供给”上的创新努力对宏观调控又会生成一些新的认识,可以帮助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差异并进一步探索未来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可遵循的路径。

1.相对完整框架的简述

传统理论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于对供给和需求及两者关系的认识,并基于纯生产者和纯消费者的划分,在不同类型的市场中定位供求双方并研究两者的互动关系,效用论的引入丰富了微观经济学对供给和需求的认知,并将更多的影响因子纳入微观经济学的认识框架中。然而,微观经济学的认识焦点在于通过研究资源配置问题来获得效率以实现经济增长,而对经济学的另外一个重要分支即分工的相关问题却没有给予充分重视,“新框架”则弥补了这一空缺。经过对专业化经济和组织模式的研究,新框架更加认同“技术和经济制度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处理最优决策的角点解,从实现了内生行为人生选择专业化水平视角的研究。两者当然不是割裂的,通过超边际分析而实现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认知,可以作为资源配置研究的基础部分之一。

2.对经济转轨的新认识

对转轨经济学的认识,在于从计划经济“轨”转入市场经济“轨”,从而被形象地称为“转轨”之阐述逻辑。这种转轨经济学较为主流的认识实际上的关注视角正是在于资源配置这一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相关制度演化,简言之,计划经济是由计划来进行资源配置,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配置,那么经济转轨就意味着资源配置机制的转变。随着“新框架”将分工与专业化引入,对经济转轨的认识也更加丰富。传统的转轨认识实际上没有充分反映制度变化的复杂性,而经济转轨只是转轨的一部分,转轨的核心实质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从经济实践出发,处于经济转轨阶段的经济体实际上也并不仅仅面临着从计划向市场的体制转变,而且面临一方面如何提升技术水平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另一方面如何优化特定经济体成长中各演变阶段上和各经济体“特色”中的经济—政治—社会全套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基于此,可以得到三点认识:第一,按